

韩静霆揭秘《今天是你的生日,我的中国》歌词创作过程



韩静霆 资料图片

20年前的晚会主题歌

记者:你是在怎样的背景下创作《今天是你的生日,我的中国》这首歌的?

韩静霆:这首歌的创作是在1989年1月,到现在整整20年了。感谢大家还记得这首歌,还有那么多人在唱,这足以使人得到安慰。

1989年适逢北京解放四十周年,首都体育馆准备上演一场大型纪念晚会。说起这首歌的缘起,就不能不提到路建康,他是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制作总监,也是今年国庆庆典背景表演总策划。当初是路建康找到了我,邀请我做晚会的策划、撰稿和创作。这也是我首次涉足大型晚会。其中我要写晚会主题歌。

记者:宏大题材的创作多容易流于口号化,你是怎么考虑另辟蹊径的?

韩静霆:创作角度的选择很重要。主题歌怎么写?我当时考虑,1949年1月北京解放的时候,距离共和国的成立只有9个月时间了,可以说已经眺望到新中国的身影了,毛泽东同志已经看到新中国帆船的桅杆了。所以我要从更广阔的角度去写这首主题歌,要与新中国的成立勾连起来。

写起来也颇费了一番周折。我喜欢把要写的东西存储在脑子里“挂弦”,先把这根“弦”挂上,然后该干什么还干什么;但是头脑中不时会触发一些新的想法,想起几句就顺手在能写字的地方写上几句。但总感觉缺少点什么来激

发创作的灵感。

公交车上灵感突至

记者:你在歌词中把“鸽子”作为一个富有诗意的意象,为什么会选择它?

韩静霆:说来也巧,刚好当初我和信鸽协会接触比较多。我经常去那儿看鸽子,久而久之就和鸽子有了感情。“放飞”这个词,别看现在用得满大街都是,但在我之前音乐作品中很少有人用。因为信鸽协会常常有放飞鸽子比赛,我刚好找到了这样一个象征物和载体。

记者:角度和载体确定后,创作是否就水到渠成了?

韩静霆:还需要有一个灵感迸发的过程。我记得有一天,我跟老伴坐公共汽车出去玩。没想到车刚走了一站地到军事博物馆,忽然被一幅宣传画吸引住了:朝阳初升的背景下,几只展翅的鸽子口衔橄榄叶,飞翔在金色的麦浪上空。鸽子,橄榄,麦穗!希望,和平,收获!突然灵感就来了,于是折返回家,在床上打了一个滚,喊了一声:“开了。”这首歌就产生了。

谷建芬首唱 听众坐满过道

记者:很多听众都是从韦唯、董文华的演唱中学到了这首歌。她们是不是首唱?

韩静霆:这首歌韦唯、董文华都演唱过,但她们都不是首唱。首唱是曲作者谷建芬。

谷建芬拿到歌词一个星期左右,给我打电话,让我们几个人到她家去听,路建康也

去了。在她家走廊过道上坐了一排人。谷老师自己弹着钢琴,轻轻地唱,非常柔和,那个场面现在想来心里都装满了温馨。那时候的我,激动不已,泪流满面……

记者:据说当初歌名是“十月是你的生日”,后来又改了?

韩静霆:这首歌创作之初,叫“十月是你的生日”;后来才改成“今天是你的生日”。所以谷老师唱的时候确实是唱的“十月是你的生日”。

当然,改动的地方还不止这一处。记得还有一段写到漂流瓶,后来嫌太长,就拿掉了。

记者:这首歌赚了多少钱?

韩静霆:第一次收到这首歌的稿费是60元钱。现在在卡拉OK放这首歌,如果是正规的,唱一次要给我8分钱。

这歌从我生命中剥离出来

记者:创作之初有没有想到过会传唱这么久?

韩静霆:确实没有想到过。一首歌曲能够流行,取决于词、曲、唱好多因素。从歌词创作来说,这首词有我的切身体会,也有切肤之痛,难免把自己的一己悲欢和国家的悲欢融合在一起;只有这样,歌词中那种一己的叙述、那种本我的表达才找到了支点,才有可能让这首歌飞得更高,传得更远。

每次听这首歌都很激动,毕竟是从我的生命中剥离出来的东西。个人际遇与国家变迁,是骨头脱不开皮肉,谁也离不开谁。据《南方都市报》

人物小传

曾在农场给猪诵诗 如今成了空军少将

乐系,“文革”中韩静霆被派到河北宣化部队农场劳动。

“那时候我就开始了写作,但不知道写给谁。好在当初我们有一个猪圈,我就在猪圈的木头上一坐,开始朗诵我的诗。猪就趴在一侧,一边哼哼一边听。我也不知道它听懂没有。”

1973年,韩静霆被分配至北京军区炮兵部队;1976年又调入空军文艺创作室,历任创作员、副主任、主任至今,并拥有空军少将军衔。

韩静霆涉猎的艺术领域极其广泛:小说、散文、报告文学、歌词、二胡、琵琶、绘画中的人物、花鸟等均有涉足,其文学作品《凯旋在子夜》《战争让女人走开》曾影响了上世纪80年代的青年人,歌曲《今天是你的生日,我的中国》《世纪春雨》《高山流水》《断桥遗梦》被广为传唱。

据《南方都市报》

韩静霆谈儿子:雪村常搞歪门邪道

著名艺术家韩静霆有一个很另类的儿子雪村。韩静霆在接受访问时笑言:“儿子是我们教育的一个失败,不过在我看来,有奇思妙想也不是坏事。”

“我儿子经常搞一些歪门邪道,我也管不了他。当然有时候他也会承认原来你吃的盐比我多。”说到儿子的教育,韩静霆说,“完全是一个失败。这孩子乐感特好,4岁就能作曲,在别人作的词下面写上‘我曲’。综合

于丹:文化成长在我们的血液里

我怀有纯粹的情感。

80年代是诗意的时代

1980年上高中,1989年硕士毕业,我非常庆幸自己一生最重要的10年是在80年代度过。现在想来,中国文化价值的缔结,80年代是一个重要阶段。朋友口述史在写《80年代访谈录》的时候,我们就曾长时间讨论,什么是80年代的气质?

我高中在四中就读,那时大家都是十四五岁,正是人生观价值观开始养成的时候,四中的高考升学率非常高,但是最让我自豪的却是在高考前一个星期,我们可能还在农村写生、老师还会组织我们看电影、我还和男生挤在一起看世界杯……那时候也知道要考试,而且比现在难得多,录取率是3.5%,但我们敢这样,觉得没有什么理由去剥夺每一天恣肆的青春,没有毕业生被重压成为奴隶的窒息。

本科时,我学古典文学,但大部分时间用来读康德、尼采、黑格尔,读弗洛伊德、海德格尔、萨特……80年代给人的最大冲击就是多元化被允许,所以人们不仅看到了传统文化的复兴,还看到了大量西方文艺的解禁。我们常常会想:自己正在进入一个什么样的时代?你可以把汤显祖和莎士比亚同时摆在案头,把十四行诗和唐诗一起品鉴,在欣赏爵士摇滚的同时,看山水画徐徐展开……80年代被诗意主宰,每个人不是诗歌的阅读者,而是诗意的生成者。

应该说,我个人的文化气质主要在80年代养成,它让我一辈子的基调成为不妥协的理想主义者。学生有时会问:人到40多岁,你怎么还可以把理想看得这么重?其实,我相信在现实中,每一个人都要被规则说服,都或多或少会让步,但你只有首先让自己成为一个理想主

义的物种,在现实弥合中才能保持一部分理想成分,如果一开始你就把自己打造成现实主义者,那去哪里寄存梦想?

人生是有季节的

1989年,我研究生毕业,正好赶上国家号召大学生下基层锻炼。我被分配到文化部的艺术研究院的印刷厂锻炼,带着户口,到丰台一个叫柳村的地方,呆了两年。

这两年对于我来说特别重要,因为它让我明白,文化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。其实刚去的时候也有巨大的失落——我们9个人,全都是最好大学的硕士,好不容易进了艺术研究院,还没等做研究,就先下放了。

在柳村,有本书在枕边一直陪着我,是陈鼓应先生的《庄子今注今译》。小时候,父亲就拿着这本竖版的厚厚的很难读的书跟我讲,这是庄子最好的注译本,你只要把它读好就行了,后来这本书传给我。柳村两年里,那本书一直放在床头。就是在那时候,我真正开始亲近道家,并读懂了庄子:什么叫乘物以游心;什么是逍遥游;什么是天地有大美而不言,四时有明法而不及,万物有成理而不及;什么是外化内不化……

人生是有季节的,什么季节相逢什么文化,这是一种缘分,对我来说,不到柳村就不会懂得道家。从柳村回来以后,我到了中国文研所,那段时间倒是真正开始触摸并懂得了儒家。

90年代初是中国文化的蓬勃阶段,多元思想进入争鸣,物质的繁荣开始兴起,整个世界变迁很大。文化所有同事叫傅道彬,比我大五六岁,那时他是哈师大老师,被校长刘梦溪先生请来做研究。傅道彬曾对我说,文化从其本义来讲,是《周易》传



于丹简介

1965年6月生于北京。北京师范大学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、艺术与传媒学院副院长,著名电视策划人,古典文化研究与传播者。著有《于丹〈论语〉心得》《于丹〈庄子〉心得》《于丹·游园惊梦——昆曲艺术审美之旅》《于丹〈论语〉感悟》。

中的一句话,观乎人文,以化成天下——那是18年前。就在上个月,我和傅道彬再相见,仍然感慨中国终于走到了这样一个多元和开放的文化时代,文而化之这件事情,我们都看到了。

1994年前后,我变得浮躁,我忽然意识到,我这么年轻就在书斋里,会研究出什么名堂?觉得自己再这么下去肯定不行,所以决定考博士回师大,这一次没有选择再进文学院,而是读传媒,此后教的学生带的学科都是大众传媒。当然每天也教诗词课,但我觉得归根到底是传媒在改变世界,而我们应该观察这种发展与进步。我曾在很多场合公开说,不管大家怎样认为,我其实是一个教了16年电视新闻采编的老师,这个才是我一辈子的职业。

文化路上的持灯使者

我一直觉得自己很荣幸,和文化结缘早,并让它陪伴我一辈子,但最重要的是,我的成长得益于无数前辈的提携,在跌跌绊绊40多年生命中,正是有无数双手为我持灯引路,才会有文化相伴我一生。

90年代初,我曾工作了6年的研究院就在现在的恭王府里,二楼的老地板吱吱呀呀,透过雕花看见紫色的泡桐花在春天蓬勃开放,院子里的边角匍匐着衰草,早晨的阳光从窗棂里打进来,逆着光你能看见浮动的尘埃。所长刘梦溪先生把宋儒张载的4句话挂在墙上:为天地立心,为生民立命,为往圣继绝学,为万世开太平。

刘先生总说,“多好啊,张载的四句话,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情怀与使命。”这四句话,直到今天想起,还会热泪盈眶,而当年刘先生对着它唏嘘不已的情形更是刻骨铭心。在研究所,我一个小编辑,却成天跟在大家的后面约稿,我去李泽厚先生家,进了门根本不提稿子的事儿,却高谈阔论美的历程,对面李先生看着我像看小孩儿,看一会儿突然走到冰箱跟前拿一大块巧克力,说,吃。等我说完,拍拍屁股要走,李先生捧着他的《论语新著》说,你把这个拿走。到现在李先生见到我还说,他记忆中还是我20多岁的样子。

文艺美学大家金开诚先生,生病后一直想要找我聊聊天,见面后,他说:“于丹,我们这些老人想了多少年都没做到的事,你做到了。只要我还能陪着你走,有什么可以帮你的你就说话。”结果这话说了不久,他查出肠癌。动完手术以后,给我打电话:“我可能不能陪着你走更远了,但是这些事情你要做下去。”最后弥留的那几天,《金开诚文集》出版,在第一套文集上题完字后,金先生对师母说:“这个文集放在你手里,交给于丹。我和她通电话她在电话里都哭得不行了,现在这个样子,她看見心里会难受,让她有时间更多地做事儿吧,我帮不了她,我不能干扰她……”所以,金先生的追悼会上,师母一直背着这套重重的文集,直到亲手交给我,师母说,这是他的心愿,我交给你。

前不久去世的任继愈先生,有一次,我去北图找他,任老那时候身体还很好,小小的个子,说话铿锵有力,说自己最不喜欢的就是从幼儿园开始就教孩子标准答案,“一块小饼干,咬一口,问这是什么,标准答案是月牙,如果有孩子说这是小船就会被判错。从幼儿园就要有标准答案,我们的思想怎么会解放呢?”他学问之深,境界之大,人生历练之过,但同时他不迂腐不衰老,不纠结于细枝末节,他知道建立一个开放标准对一个时代来讲是多么重要……

文化的大家生命皆通达博雅,生活在这些老人的目光里,会发现他们是在用自己的情怀说话。其实,文化是什么呢,文化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力量,是一种传承,文化就是很多人做一件薪火相传的事情。所以,无论陈鼓应、刘梦溪、李泽厚,只要这些老人我现在还能看得到,我就不能停下,要做更多更多的事情,因为自己的身上是有托付的。

我只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国女人,你甚至可以不把我看成一个教授,我只是教传媒的,不是教国学的,我只是作为一个局外人的身份热爱这个文化,因为它支撑了时代,给了我生命的基因。

据《国际先驱导报》(于丹)